

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十年:

迈向更深层次的互惠合作

赞助机构



CHINA-UNITED STATES
EXCHANGE FOUNDATION
中美交流基金會

目录

前言

鸣谢

概要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中国和美国国情不同，历史和文化迥异。两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也各不相同，一方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另一方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经济规模巨大，都以不同的方式促进了世界经济活动。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已过去四年，金融稳定依旧遥遥无期。如果两国能够携手合作，双方可以更好地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并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此外，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贸易国，如果能共同合作，将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促进货物和服务贸易进一步自由化。

事实上，无论是能源安全、粮食储备、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核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防止疫情，还是阻止毒品走私，以上种种及其它当今世界面临的跨国挑战都需要多边协作。但如果中美两国能就以上任何问题进行合作，成功则大大可期。鉴于此，从全球视角来看，中美关系是目前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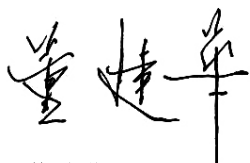
从双方视角来看，中美经济关系在过去几十年已有长足发展，从几乎不存在到日渐发展为相互高度依赖和互利的双边关系。然而，未来这一经济关系又将走向何方？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中美交流基金会聘请了一批杰出学者，包括两国学术、商业以及政界领袖，就这一经济关系展开研究。这一研究报告不仅回顾过去，同时审视那些阻碍双方进一步商贸关系的商业困境。最重要的是，该研究报告展望未来，总结提出“两国都希望为本国国民建立一个安全可靠的、高质量的、可持续的发展和就业的模式。本项研究认为，这种双边关系，若能与时俱进，定能为双方实现共同目标做出重大贡献。”确实，在未来十年中，两国的紧密合作可以创造巨大商机并为各自人民带来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中美关系从全球视角来看是至关重要，从双边视角来看也是如此。

毋庸置疑，过去的42年以来，美国八任总统和中国五代领导人高屋建瓴，致力于创建良好的中美关系。虽然历经起伏，但中美关系始终都在往前迈进。

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由于了解不够、互信不足及各自在某些全球战略性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受到影响。而且，在商业关系中也遇到不少阻碍，例如网络安全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为此，未来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我们需要建立互信，还要处理好各类分歧和阻碍。但无论如何，以上都不应成为两国进一步合作的绊脚石。

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呼吁中美两个大国建立新型的双边关系。双方领导人都刚开始新一任期。让我们抓住这一历史时刻，为这一目标奋斗。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有益于两国人民以及世界的长期和平与繁荣。



董建华

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鸣谢

执行委员会

中美交流基金会对执行委员会成员致以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为本开创性研究报告的出版所做出的贡献和努力。

执行委员会负责本报告的计划、组织及研究。本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主报告,第二部分则包括支持第一部分的多篇分报告。执行委员会全权负责第一部分内容。至于第二部分内容,执行委员会主要负责列出拟研究的题目,并邀请个别作者独立撰稿。

共同召集人

冯国经

冯氏集团主席

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主席

中美交流基金会副主席

刘遵义

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

斯坦福大学李国鼎经济发展荣休讲座教授

成员

迈克尔·博斯金 Michael J. BOSKIN

美国斯坦福大学Tully M. Friedman经济学讲座教授、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海闻

北京大学副校长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兼汇丰商学院院长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樊纲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北京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

迈克尔·斯彭思 Michael SPENCE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坦福商学院Philip H. Knight管理学荣誉教授

200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指导委员会

中美交流基金会对指导委员会成员参与本项研究及所做的贡献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他们为本项目和报告初稿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指导委员会发挥的作用属于顾问性质，其成员并不负责本研究报告的内容。

中方参与人员

常小兵

中国联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傅成玉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

盖志新

中国国旅集团董事长

胡茂元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汽集团”)董事长

江广平

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

姜建清

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

马春雨

海尔集团美洲市场总监

马秀红

中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理事长

中国商务部前副部长

宁高宁

中粮集团董事长

倪频

万向美国公司总经理

施正荣

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兼首席战略官

孙安民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全国工商联常务副主席

王春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前主任

魏家福

中远集团董事长

向文波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姚强

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教授

赵令欢

弘毅投资总裁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周文重

前中国驻美国大使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鸣谢

指导委员会

美方参与人员

彭安杰 Ajay BANGA

万事达卡国际组织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鲍达民 Dominic BARTON

麦肯锡公司全球董事长兼总裁

薄迈伦 Myron BRILLIANT

美国全国商会常务副总裁兼国际事务总裁

程守宗 John CHEN

高级顾问, SilverLake Private Equity
卸任主席、行政总裁兼总裁, Sybase Inc.

理查德·戴利 Richard M. Daley

图博有限责任公司执行主席
凯腾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

傅强恩 John FRISBIE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

比尔·盖茨 Bill GATES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
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及主席

莫里斯·格林伯格 Maurice R.
GREENBERG

C. V. 史带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卡洛斯·古铁雷斯 Carlos GUTIERREZ

前美国商务部长
副董事长, 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

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基辛格顾问公司董事长

利伟诚 Andrew LIVERIS

陶氏化学总裁、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麦睿博 Robert A. McDONALD

美国宝洁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哈罗德·麦格三世 Harold McGRAW III

麦格希财讯集团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戴瑞礼 Dennis M. NALLY

普华永道全球主席

卢英德 Indra NOOYI

百事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欧伦斯 Stephen A. ORLINS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

詹姆斯·欧文斯 James W. OWENS

卡特彼勒有限公司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约翰·波德斯塔 John PODESTA

美国前白宫幕僚长
美国进步中心主席

莊睿思 John RICE

GE公司副董事长、全球增长及营运总裁兼首席
执行长

罗杰毅 James ROGERS

杜克能源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大卫·鲁宾斯坦 David RUBENSTEIN

凯雷集团联合创始人及联席首席执行官

彼得·塞里格曼 Peter A. SELIGMANN

保护国际基金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安迪·斯特恩 Andy STERN

哥伦比亚大学里士满中心高级研究员
服务业员工国际工会前任主席



研究与支持

以下机构参与了研究工作并对本报告的出版提供了支持，中美交流基金会在此一并致谢。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www.csis.org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项目负责人陈文玲)

www.cciee.org.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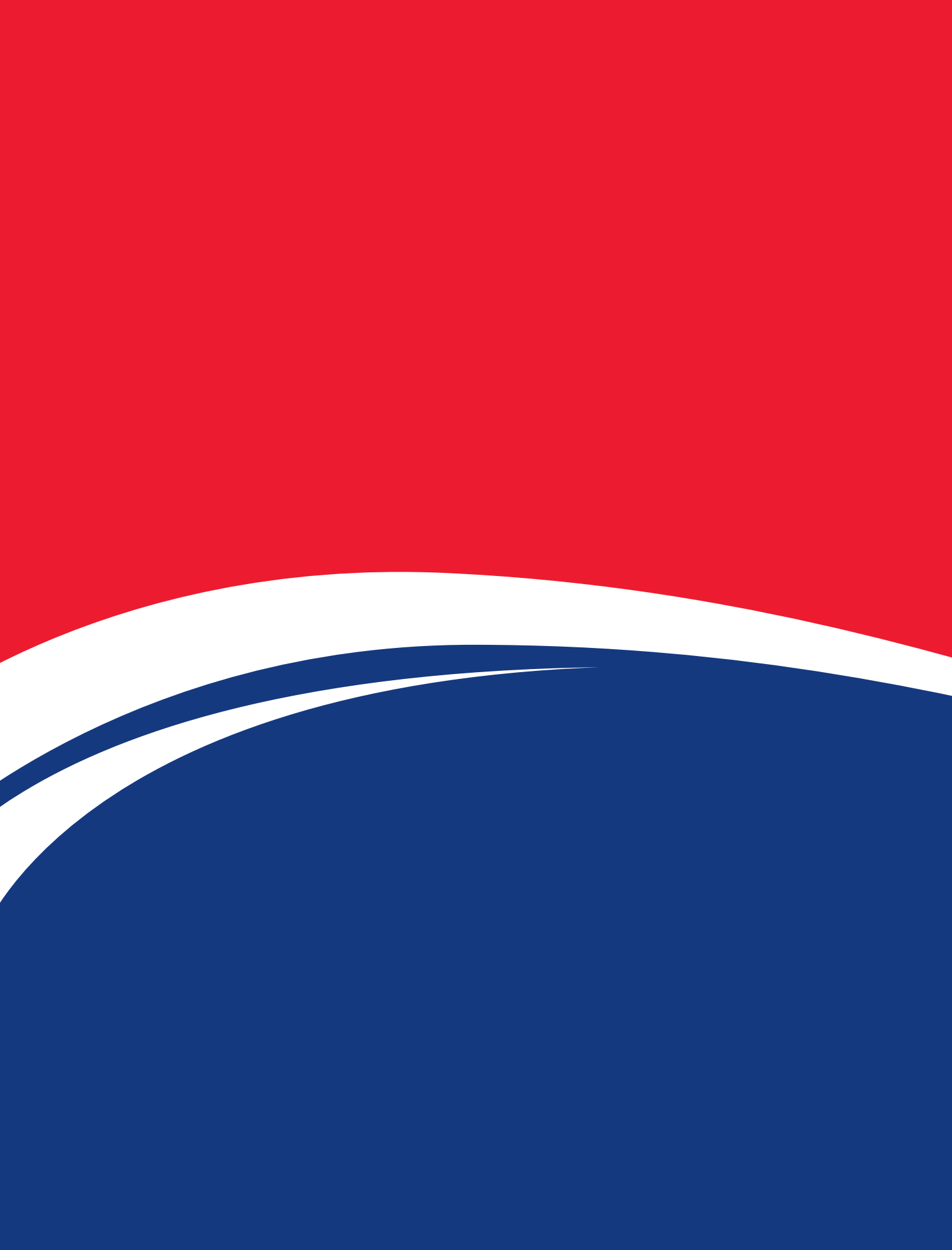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霍建国)

www.caitec.org.cn

香港研究团队

(项目负责人郭国全)



概要

过

去35年间，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从几近空白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目前，中美互为对方第二大贸易伙伴。大规模货物及服务贸易、供应链集成、美国对华大规模直接投资以及中国更大规模投资美国国债，无不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虽然两国经贸关系时常发生摩擦，但也给双方带来了巨大利益。

本项研究的目的是回顾过去35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的演变，从而理解两国对这一关系的相互依赖性。更重要的是，本文展望了两大经济体在未来十年可能的发展路径，以及未来两国如何实现更大的经济利益。两国均希望为本国国民建立起一种安全可靠、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和就业的模式。本项研究认为，这种双边关系，若能与时俱进，定能为双方实现共同目标做出重大贡献。

事实上，两国经济的发展已到了重要的十字路口。对中国而言，沿袭了30多年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做出改变，从出口主导转为内需主导，从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如果中国能在未来十年成功实现这一转变，将创造出一个规模空前的高达6亿人口的中产阶层，中国也将因此从“世界工厂”逐步转变为“世界市场”。

未来十年，随着美国进行结构调整以削减财政预算、贸易赤字并降低失业率，美国经济将实现稳健复苏。事实上，由于其在科学、技术及创新上的统治地位，以及更廉价的页岩油气所带来的能源优势，美国经济应该会持续受益。过去数十年美国能源依赖进口，而现在美国、加拿大甚至可能包括墨西哥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增长，以及能源使用效率提高，都将成为美国主要的“游戏规则改变者”，有人甚至预测，美国最终将成为能源净出口国。

虽然两国经济前景看起来充满希望，但我们不应低估各自面临的挑战。中国亟需深化经济改革，重新定义政府角色，提高经济的市场反应

能力，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环境恶化、基础教育和医疗覆盖不平衡等问题，完善法律法规和打击腐败。对于美国而言，其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达成经济政策上的理性共识，从而确保经济能在某种程度上按预期发展。从世界范围看，两国仍面临欧洲经济不确定性以及可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此外，面对核扩散、恐怖主义及领土争端等问题，两国必须携手维护世界和平。两国面临诸多来自国内和国际的挑战，这些挑战不易解决，也不容忽视。

在前进道路上，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两国间总体关系的发展，受制于两国在某些全球重要战略问题上互信不足且存在分歧。因此，双方必须逐步建立互信，控制和处理好战略分歧。建立互信并非一蹴而就，但是我们希望这些分歧不会妨碍两国建立更为紧密的经济合作。

此外，两国企业界已经明确两国商业增长中存在的困难和阻碍。对美方来说，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角色问题（包括作为贷款提供方的国有银行问题），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以及网络安全问题（尤其在盗窃商业秘密方面）。而对中国来说，这些问题包括美国限制高技术产品向中国出口，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经常表现独断，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在一个广泛和不断变化的中美经贸关系中，势必存在争议和问题。坦白承认并承诺解决这些问题是双方关系成熟的表现。本项研究不可能完全和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其主要目的在于关注两国如何通过合作增强经贸关系。成功的合作不仅使两国人民获得经济利益，而且有助于两国建立互信。正因如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会对深化两国交流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中美两国经济攸关性很强。毫无疑问，两国经贸关系的扩大将带来巨大收益。未来十年，预计美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将略低于3%的水平，而

同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速将达到7.5%左右。增进合作将为两国带来巨大的潜在经济机遇，其中有些机遇更有利于中国，而有些则对美国更有利。但无论如何，两国都会实现双赢。

两国可通过合作获得大量经济机遇，以下几点为例：

- 一、科学和技术合作，特别在能源方面，可以提高两国能源利用效率并更加环保。这些努力最终有助于削减温室气体排放，进而降低气候变化风险。2006年，中美两国政府联合启动了该领域的合作，这一任务在未来将更为迫切。
- 二、作为全球两个最大贸易国，中美应带头重启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并就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启动早期磋商。
- 三、未来十年，美国将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项目重建工作。中国投资者可以利用其储蓄盈余，以债券或股权方式，为其提供融资。这不仅对美国有利，同时也有利于中国，因为投资回报相当诱人。

通过与中国扩大合作，美国将受益于如下经济机遇：

- 一、2000至2010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五倍。未来十年，预计随着中国经济和中产阶级规模继续扩大，美国对华出口很可能延续这一趋势，中国将可能取代加拿大和墨西哥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此外，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前景光明。通用汽车已成为中国汽车市场的领头羊，沃尔玛是中国最大的零售商，麦当劳和肯德基在中国家喻户晓。以上企业及其它尚未投资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在中国发展的潜力巨大。
- 二、2012年，仅有150万中国人前往美国旅游。如果能进一步简化签证手续，到2020年，预计

这个数字将超过每年500万。

- 三、像过去日本公司一样，中国公司希望通过在美国境内生产最终产品来进入美国市场，这会拉动美国GDP并创造就业。汽车零部件、高端钢铁产品及家电消费行业正在引领这一潮流。

通过与美国扩大合作，中国将受益于如下经济机遇：

- 一、粮食和食品安全问题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普遍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国正在推动农业及相关产业现代化。美国拥有最先进的农业技术以及食品安全保障制度。美国耕地广袤，农业产量大、效率高，可帮助中国确保粮食和食品的安全性。
- 二、尽管目前中国能源严重依赖煤炭，但中国页岩油气储量巨大。与美国公司就中国新兴的页岩油气产业进行投资和技术合作，有助于中国降低对煤炭能源的依赖。
- 三、中国服务业相对不够成熟，而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服务业。中国需要发展服务业，向其国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美国公司可以通过对华出口和直接投资，帮助中国发展服务业。

如果上述情况能够实现，将为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经济机遇，这些机遇会转化为就业机会。例如，截至2022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预计将创造181万个新就业岗位。

为了更好地抓住经济机遇和创造就业，我们为两国政府提出如下建议：

- 一、借助两国政府机构的专家意见，两国智库应就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和利益进行研究，并于一年内完成相关研究报告。如果取得积极的研究成果，则应发起相关谈判进

程。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因此两国应带头重启多哈回合贸易谈判。

二、对建立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讨论已有不少时日。为了推动双边投资流动，我们催促两国政府尽快（最好在一年内）完成正在谈判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

三、两国政府需要鼓励更多企业在能源领域实现科技合作，例如可再生能源、页岩油气、二氧化碳捕捉、使用及隔离、电动汽车等。此外，由于以上合作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两国应在2013年12月的德班会议上达成共识，联合其他国家共同确保在2015年成功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关成果。

四、两国应该简化签证申请程序，并逐步将签证有效期延长至5年、10年并最终实现免签。在两年内实现两国签证5年有效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开端。

五、在美国国务卿克里访华期间，两国同意在“战略与经济对话”层面建立一个讨论网络安全问题的特别小组。这个小组应致力于制定一个路线图，内容包括：第一，两国在网络安全领域如何加强合作和提高执行力；第二，两国如何合作制定一项针对网络空间的国际准则。这些任务迫在眉睫，我们建议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小组应该在18个月内完成此项谈判，并在此期间及时发布中期报告。

六、不管是出于全球还是国内利益考虑，中国都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保护法。事实上，由于激励创新、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需要，中国自身也希望保护知识产权。为了达到此项目标，还需要进行很多工作。我们对中国政府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国务院负责知识产权保护的跨部门机构—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应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以确保顺利执行和制止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第二，中国应考虑建立一个全国性特别法庭

处理知识产权纠纷，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中国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和处置；

第三，我们看到，最近“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协议，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将在2013年底前全部使用正版软件。我们敦促所有国有企业和银行系统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此项工作。

七、放松高科技出口管制是中国的一贯主张。我们建议美国政府应加快处理该问题，并希望出现一个双赢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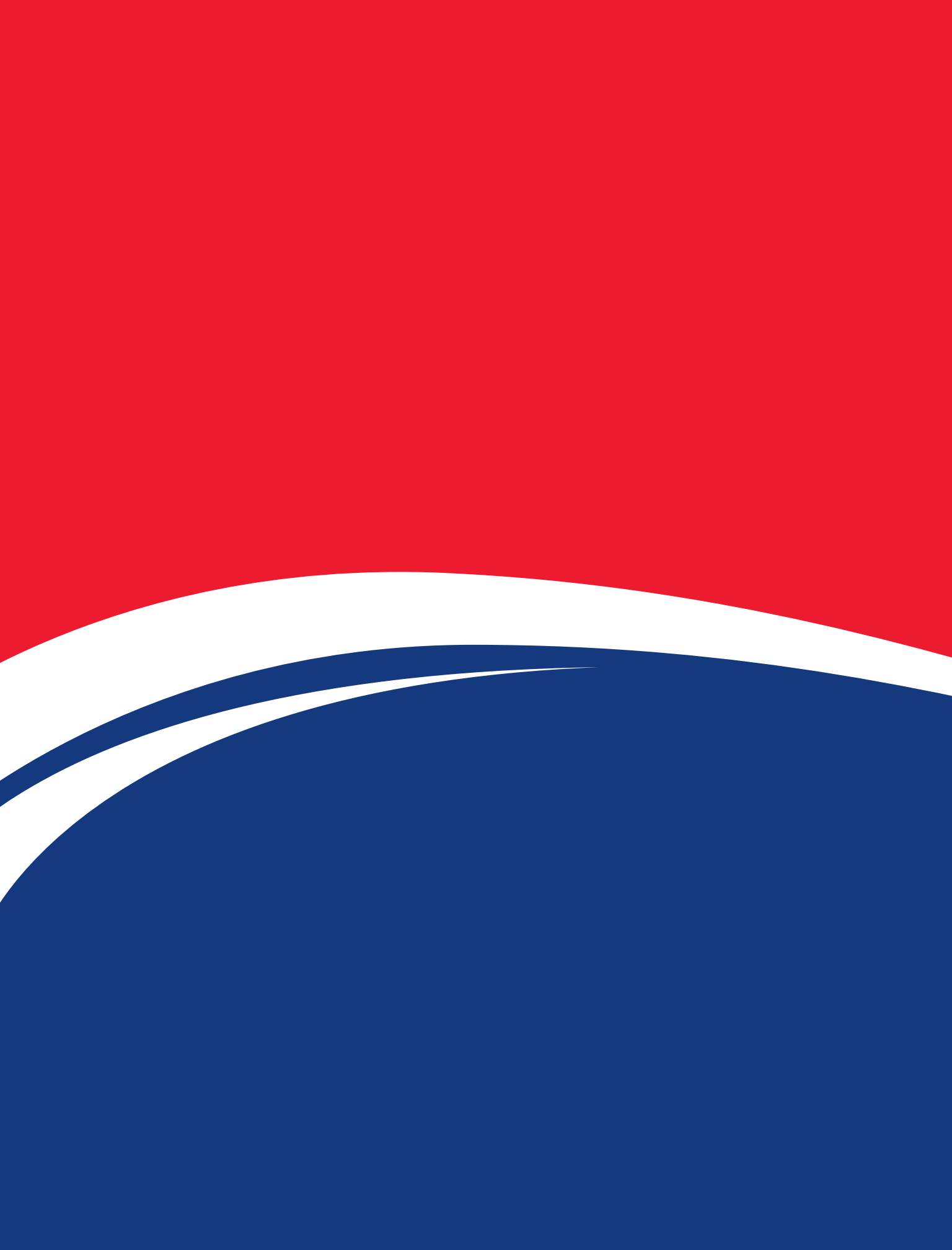
八、美国部分针对中国企业贸易和投资的政府决策，包括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法案，建立在政治而不是政策考量之上。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运作应该更加透明，更容易被中方理解。我们建议美国政府发布更加清晰的投资审查流程。

以上涉及到中美两国的重大利益，这是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关系，对世界而言也极为重要。虽然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无法确保全球经济繁荣昌盛，但不稳定且毫无成效的中美关系却一定会危及全球繁荣。

若两大经济体能够持续成功合作，到2022年，中美双边关系的相互依赖度将远超之前。与此同时，通过更好地保护环境、降低气候变化风险、加强多边贸易体系，两国可为全球公共利益做出巨大贡献。最重要的是，这种相互依赖性为两国间整体关系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目前，两国领导人开始了新一届任期。为了实现经济和就业的可持续增长，两国正在为经济发展确立一个新的方向。携起手来，两国一定能共创未来！时不我待，让我们抓住机遇！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一、把握有利时机

一代人的机遇

过去的几十年，中美经贸关系从无到有，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如今，美国和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贸易国，还是彼此第二大贸易伙伴。目前，庞大的货物贸易量、供应链集成、不断扩大的服务贸易规模、美国对华大规模直接投资以及中国更大规模地购买美国国债，无不说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虽然两国经贸关系时常发生摩擦，但也带来了巨大的双边利益。

基础经济学认为，两国双边贸易规模与两国经济规模成正比，因此展望未来，中美两国庞大的贸易规模，以及伴随未来经济增长不断扩大的趋势并不令人惊讶。如果中美两国希望继续享受并扩大双边经贸利益，就必须共同探寻新的合作机遇。

本项研究的目的，一是将中美关系放在当前不断发展演进的经济环境中进行考察；二是发掘具有合作潜力的领域，针对如何抓住机遇和解决分歧提出可行方案。通过提高对整体经济框架的了解，本项研究希望能够为推动全球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的建设性发展做出贡献。两国均希望为本国国民建立起一种安全可靠、高质量、可持续的增长和就业的模式。本项研究认为，这种双边关系，若能与时俱进，定能为双方实现共同目标做出重大贡献。

在前进道路上，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两国间总体关系的发展，受制于两国在某些全球重要战略问题上互信不足且存在分歧。因此，双方必

须逐步建立互信，控制和处理好战略分歧。建立互信并非一蹴而就，但是我们希望这些分歧不会妨碍两国建立更为紧密的经济合作。

此外，两国企业界已经明确两国商业增长中存在的困难和阻碍。对美方来说，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角色问题（包括作为贷款提供方的国有银行问题），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以及网络安全问题（尤其在盗窃商业秘密方面）。而中国则认为美国限制高技术产品向中国出口，美国政府对华贸易和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方面也经常表现独断，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这些问题真实存在，并与两国扩大经济互动密切相关。在一个广泛和不断变化的中美经贸关系中，势必存在争议和问题。坦白承认并承诺解决这些问题是双方关系成熟的表现。如果要解决这些问题，两国政府必须坦诚地面对它们。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时间，但必须以积极态度推动解决¹。

在讨论未来之前，让我们从了解历史开始。四十一年前，美国的尼克松总统和中国的毛泽东主席把握时机，促成了中美两国合作，共同抵御前苏联霸权。两国领导人明白中美关系对两国的战略重要性。他们的合作改变了世界！

1978年12月15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三天之后，中国宣布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向世界开放。从那时起，中美关系历经8任美国总统和4代中国领导人。四十年来，两国致力于建立一个强大和持久的中美关系。虽然时有起伏，

¹ 第二部分第6篇分报告集中讨论了这些问题。

但双边关系总体保持了稳定发展。随着1991年前苏联解体，中美经贸关系逐渐发展成为中美关系的基石，两国从双边经贸关系中获益良多。

然而，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到了紧要关头：中国必须改变三十多年来一贯遵循的发展模式——从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内需（包括消费）拉动型，从输入驱动型转向创新驱动型。此外，几十年来的收入与财富的持续增长，开始使中国成为世界市场中越来越重要且快速增长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世界工厂”和跨境投资的重要源头和目的地。为此，中国将不得不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角色。如何适应这些新的现实问题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巨大挑战。的确，今后的十年将是中国发生变革的十年。近年来，美国经济正在从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也不得不开始对经济结构做出重大调整，在减少预算和贸易赤字的同时，努力降低高失业率。但是，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和技术最先进的国家，还享有获取更廉价的页岩油气所带来的能源优势。的确，未来十年对美国而言也将是变革的十年。

未来几十年，中美两国将依然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奥巴马刚赢得了总统连任，习近平则于2012年11月当选新一任中共总书记，于2013年3月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将在未来十年中领导中国。中国和美国必须现实地面对两国所面临的挑战，包括两国之间和本国国内由于经济发展和贸易投资增长而引起的错位问题。中美两国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可以帮助两国推动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两国需要抓住机遇，为今后十年开展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奠定基础。

两国还面临许多共同的挑战，如核扩散、恐怖主义、可持续发展以及气候变化问题。两国的协同合作将会帮助两国成功应对这些问题。这不仅是为了两国的自身利益，也是为了世界的长期和平与繁荣。鉴于今天两国经济存在高度的相互依赖性，如果两国间互相对立，将会给他们

自身乃至其他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承认差异的研究

本项研究汇聚了中美两国顶尖的经济学家和企业领袖，在总结过去的同时，更加注重展望未来。研究概述了两国通过经济交流和互动实现的收益与付出的成本，还指出了两国经济基本面的互补性，这是两国实现长期持续经济互惠合作的基础。此外，我们认识到，两国探寻互惠合作领域的做法，必须考虑到两国在实现复苏和长期包容性增长的过程中各自面对的难题和挑战。

最后，本项研究详细阐述了中美两国在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方面的合作机遇。例如，作为两个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在减缓气候变化所产生的风险方面，以及作为两个最大的贸易国，在进一步加强多边贸易体系建设（通过多哈回合谈判）方面，显然需要加强合作，并在全球寻求解决方案过程中发挥领袖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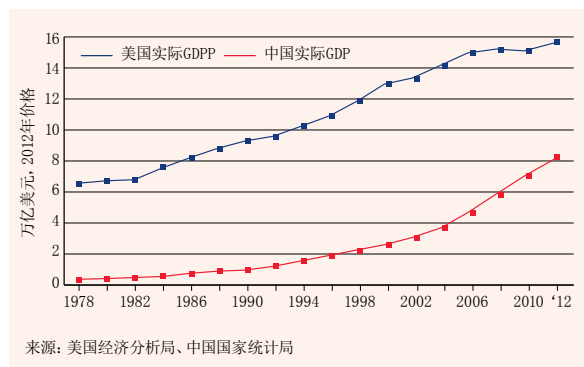
二、回顾过去

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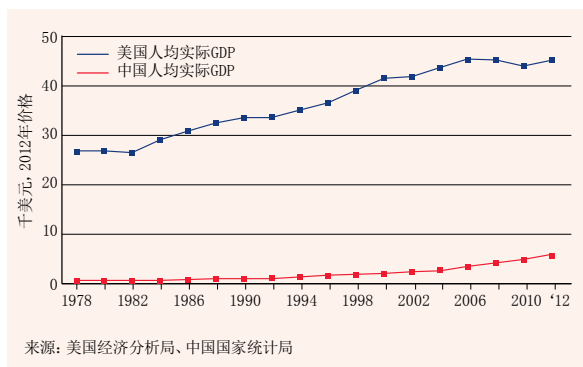
1978年标志着中国推行经济改革开放政策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混乱和经济停滞时代的结束，从此，中国逐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在1978—2012年间，中国实际GDP从3,410亿美元增至8.262万亿美元（按2012年价格计算），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见图1）。

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十年：迈向更深层次的互惠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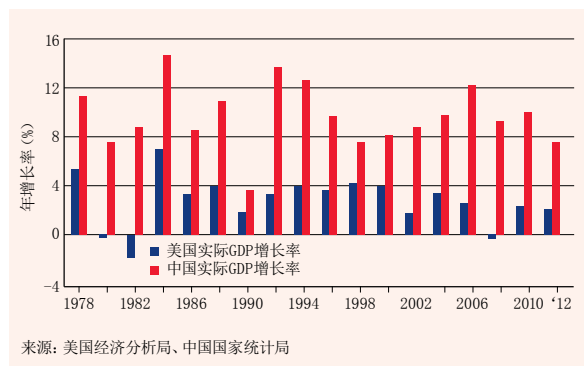
图表1: 1978-2012年中美两国实际GDP



图表3: 1978-2012年中美两国人均实际GDP



图表2: 1978-2012年中美两国实际GDP年增长率(%)



中国已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1978年以来,计划经济已基本让位于市场经济,现代化基础设施得以建立,对所有适龄儿童实施免费的9年制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得到普及。总之,数亿人民摆脱了赤贫,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在这35年里,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具国际视野和环保意识的新一代中国人已经成长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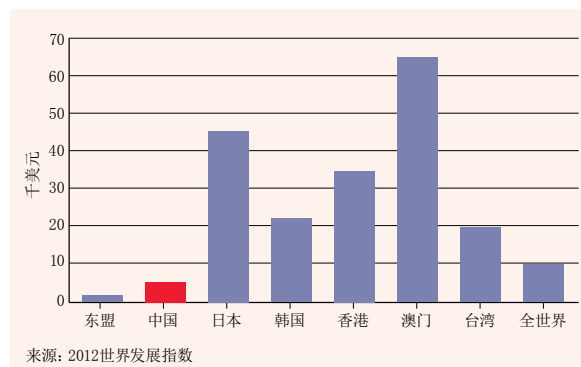
1978年,美国经济仍处于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复苏期,在那次危机中,石油价格上涨到原来的四倍,而仅仅一年后又发生了第二次石油危机。这两次石油危机导致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高通胀和高利率。直到八十年代中期,随着石油的实际价格下跌,通胀才恢复到正常水平。在九十年代初互联网繁荣的帮助下,美国实现了有史以来最长的经济增长,尽管其间

出现了短暂中断,但这一增长势头基本上持续到2007年次贷问题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才使增长戛然而止。从那之后,美国一直处于渐进的、从历史标准来看较为缓慢的复苏进程中。然而,从1978年到2012年,美国实际GDP按2012年价格计算,从6.54万亿美元增长到15.68万亿美元,年均增速达2.6%(见图表2),在发达国家七国集团中是最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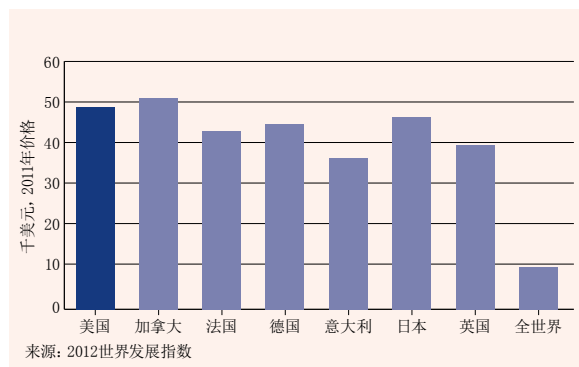
个人收入情况则是另一番情景。中国经济规模庞大原因是其人口数量庞大(超过美国人口的四倍)。尽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二,但从实际人均GDP来看,中国的排名依然在八十名以外,这说明中国依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发展中经济体。1978-2012年间,中国实际人均GDP从354美元增至6,102美元(2012年价格),年均增速达到8.7%。相比之下,美国实际人均GDP从29,390美元增至49,880美元(2012年价格),超过中国2012年人均GDP的8倍,年均增长率为1.6%,两国差距依然很大(图表3)。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实际人均GDP仍然远远落后于东亚其他经济体,例如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图表4),而美国人均GDP也远高于发达国家七国集团中除加拿大以外的其他国家(图表5)。

在1978-2011年间,中国人均个人实际消费额由168美元增至1,911美元(2011年价格),但个人

图表4: 2011年部分东亚经济体人均GDP



图表5: 2011年七国集团经济体人均实际GDP



消费占GDP比重却由48.4%下降到34.4%²。相比之下, 美国人均个人消费由17,769美元增至38,269美元(超过中国目前水平20倍)。2011年美国个人消费额占到GDP总量的70.9%。由此可见, 中美两国实际人均个人消费的差距甚至超过了两国人均实际收入的差距。鉴于中国消费量对GDP的比例较低, 中国个人消费未来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事实上, 中国能否实现持续增长, 取决于其作为国民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消费量的增长。

在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前, 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只有203亿美元, 而美国当时已经是(目前依然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 贸易总额达到3,992亿美元。最初, 中国外贸从很低的基础起点开始迅猛增长, 但主要体现在进口方面。直到九十年代, 在1994年1月1日人民币贬值及美国授予中国(非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的作用下, 推动了出口增长, 中国外贸才开始稳步增长。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外贸增幅扩大, 尤其是2005年多纤协定下纺织品贸易配额体系终结, 外贸增速进一步提高。到2012年, 中国的商品与服务外贸总额达到4.3万亿美元, 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国, 仅次于美国的4.9万亿美元, 同时中国也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

图表6: 2011-2012年中美两国国际贸易比较

	中国(10亿美元)		美国(10亿美元)	
	2011	2012	2011	2012
货物出口	1,904	2,049	1,497	1,564
货物进口	1,660	1,818	2,236	2,299
货物贸易总额	3,564	3,867	3,733	3,863
服务出口	183	197	606	632
服务进口	238	261	427	437
服务贸易总额	421	457	1,033	1,069
货物与服务出口	2,087	2,246	2,103	2,196
货物与服务进口	1,898	2,078	2,663	2,736
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	3,985	4,324	4,767	4,932
货物与服务贸易盈余	188	167	-560	-540

来源: 美国经济分析局、中国国家统计局

国(见图表6)³。然而, 中国多数出口的国内附加值始终处于较低水平, 2011年平均值大约为23.7%⁴。由于总出口中“加工与组装”产品出口比例有所下降, 预期未来国内附加值将上升。预计中国在内外因素影响下, 出口增速将下降而进口增速将加快⁵。

同期, 美国外贸增速虽然降低, 但更趋稳定, 这是因为美国基准水平较高, 且是WTO(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创始国之一, 其间只受到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和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拖累。但是, 从1997年开始, 美国对全球贸

² 2012年的中国个人消费数据目前尚无资料。1978年和2011年, 中国实际人均GDP分别为346美元和5,555美元(2011年价格)。

³ 2012年, 单以货物计算, 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 但与美国的差距很小, 而以货物与服务合计贸易额计算, 则不是最大贸易国(见图表6)。

⁴ 中国对美国的国内出口附加值更低, 2011年为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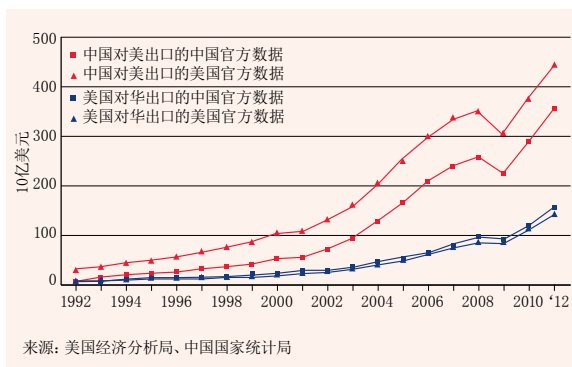
⁵ 参见第二部分第5篇分报告的讨论内容。

易赤字开始增加。然而，直至今日，美国仍然是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第一大贸易国（见图表6）。

图表7比较了中美两国在2011年和2012年的国际贸易水平。美国同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服务贸易国。有趣的是，美国对全球的贸易赤字远远超过中国对全球的贸易盈余。例如，2012年，美国的赤字为5,400亿美元，而中国的盈余为1,670亿美元。此外，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2012年中国或美国数据分别为2,010亿美元或者是2,990亿美元）比其对全球的贸易盈余还大，这表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一直处于赤字状态（见图表6）。

自1978年起，美中之间的贸易额出现了飞跃式增长。据中国官方数据，中国对美国的货物与服务出口额从1992年的96.5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3,640亿美元⁶。据美国官方数据，相应数字分别为270亿美元和4,460亿美元⁷。同样，据中国官方数据，美国对中国的货物及服务出口额从1992年的105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1,630亿美元，而据美国官方数据，相应数字分别是90亿美元和1,470亿美元。据中国官方数据，2012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为2,010亿美元，而据美国官方数据为2,990亿美元。图表7展示了基于中国和美国官方数据的中美双边贸易年度水平。两套数据均显示，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双边贸易飞速增长，并且中国拥有大量双边贸易盈余。有趣的是，从上一个十年中期开始，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比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增长更迅速。这一趋势预计还会持续，因为中国的内需（包括消费）将成为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和美国经济的相对缓慢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图表7：1992-2012年中美双边货物与服务贸易水平



全球因素

回首以往，1978年以来中美两国经济成就令人瞩目。过去35年间，中美取得的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的有利因素。

首先，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局部冲突，世界基本处于和平环境中，有利于经济平稳发展。冷战结束为全球创造了和平的局面。

第二，美国领导进行了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推动全球各地实时获取信息，即时通讯也不再受到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信息传输变得比以往更经济实惠，大幅降低了跨境和远距离商业交易成本。这不仅促进了货物贸易，还使原本不可贸易的服务成为可贸易商品。即使非常复杂的生产程序，也可以基于利润进行切割，或者称之为“原子化”——分散细化成子程序，在成本最低的不同地区完成，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另外，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统一的市场，这也提高了创新和扶植品牌的潜在收益。不管是拥有发达信息和通讯技术以及先进产品和工艺发明技术的美国，还是在全球劳动分工的最终装配阶段拥有较低工资从而形成比较优势的中国，都是巨大获益者。

然而，生产分散化和跨国供应链发展产生的全球劳动力分工和再分工，导致相关工作岗位向较低成本地区转移。那些低技能的工作岗位向海外转移，不仅对美国来说是个挑战，最近也开始影响中国。很多这种工作岗位已经从中国流向

6 2012年的服务贸易额是估算数字。官方数字尚未发布。

7 美国和中国官方数字之间的统计差异由许多原因造成。这与两国对出口额和进口额价值的计价方式不同有关（船边交货或者离岸价对 到岸价），而且与对自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产品的处理方式和计价方法等差异有关。例如，参考K. C. Fung、L. J. Lau 和Yanyan Xiong的讨论“美中双边贸易平衡调整估算值更新”，《太平洋经济评论》，第11卷，第3号，2006年10月，第299-314页。

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越南，甚至是缅甸。全球劳动力分工和再分工还意味着全球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一体化和相互依赖。

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扩大了企业高级管理层的控制面，使组织更加扁平化，并消除了很多中层工作岗位。低技能岗位的流失和中层管理岗位的消失，导致中低层工作者工资增长缓慢。因此，个别国家中，全体工作者尚未平等地享有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这已成为很多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解决这些不平衡问题仍然是各国的首要任务。

第三，全球经济中的新兴力量，包括中国、俄罗斯、前东欧社会主义经济体等，无论其是否是WTO成员，都在全球贸易增长的供给端和需求端创造了大量新机会。与欧元区和东盟地区深化经济合作也会为跨境贸易和直接投资，以及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但是，这些新兴力量也意味着全球劳动力规模扩大，给全球发达经济体工资水平带来下行压力。

第四，石油以及其他能源类产品的实际价格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本世纪中期基本保持了相对较低水平，为全球增长营造了有利的经济环境。

第五，过去几十年，全球GDP区域分布有了显著变化。东亚经济体（包括东盟10国和中、日、韩三国）在全球GDP中的比重由1970年的10%升至2012年的约25%。如果包括南亚在内，比重将达到30%。中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也从1970年不到2%升至2012年超过10%。相比之下，美国所占份额从1970年的35%降至如今的略高于20%，欧洲所占份额也由1970年的25%降至如今的20%⁸。东亚经济体占据了全球贸易四分之一的份额，而1970年大约只占10%。此外，如今东亚经济体中大约一半

的国际贸易发生在东亚国家内部。这使得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在美国和欧洲陷入衰退的环境下，虽然增速放缓，仍然能够继续增长。事实上，从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中国经济仍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

最后，过去35年里，中国领导人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赢得了广泛声誉。其间，他们展现出处理重大问题和挑战的能力，特别是带领中国成功渡过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近期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中国和美国如何获益

过去35年间，中美经贸关系为中国带来了巨大利益。中国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后，美国向中国开放出口市场，随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向中国开放。这帮助中国早期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成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授予中国（非永久性）最惠国待遇，以及2000年中国成功完成WTO谈判，都极大推动了中国外贸的发展。

规模庞大的美国消费市场为中国出口敞开了大门，包括服装、家用电器、鞋类、玩具以及所有其它种类的轻工业制造产品。据估计，2010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每笔价值10亿美元的货物和服务，为中国带来价值5.98亿美元的GDP附加值，以及每年34,000个就业机会⁹。2010年，中国对美出口额达到了2,933亿美元，产生了大约价值1,754亿美元的附加值，占中国经济总量的2.9%，以及每年997万个就业机会，占中国非农就业人口的2.9%¹⁰。中国轻工业出口主要是取代了其它东亚经济体，例如香港、台湾、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¹¹。美国已经数十年没有在本国大量生产类似产

8 如今的欧洲数据比1970年包含了更多国家，主要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东欧国家。因此其占全球GDP的比重实际上比本文中提供的数字所显示的值下降很多。

9 这些不仅包括出口直接产生的附加值和就业机会，还包括通过在出口产品生产使用的国内输入的生产间接产生的附加值和就业机会。

10 中国GDP为6.06万亿美元（2010年价格），而2010年中国非农就业人口总计为3.4687亿人。

11 见第二部分第一篇报告——霍建国的《1978年到目前美中经济关系的发展》，其中列举了多种产品，美国从中国进口比重的增加与从其他东亚经济体进口比重的减少相匹配。

品了。所以，美国向中国流失的就业岗位并不像美国政客宣称的那么多。事实上，由于工资水平上涨和环境政策更加严格，中国本身正在失去这些就业岗位，其中大部分在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经济体转移¹²。

美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已开始对华直接投资。过去十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额达到年均30亿美元。直接投资不仅给中国带来了资本，还带来了技术、人才、进入海外市场的机会、专有技术、商业运营模式和先进的管理方法。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仅仅处于起步阶段，但增长迅速，从2007年的248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772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时处于很低的水平，平均大约为每年14亿美元。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统计口径有很大差异，2011年，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字为18亿美元，而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字为43亿美元¹³。不过，目前两国在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统计数字上基本相同，大约为50亿美元。

据美方和中方统计数字，截至2011年美国累计对华直接投资存量分别为540亿美元和700亿美元，远超过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美国和中国的数据分别为95亿美元和90亿美元）^{14, 15}。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给中国公民创造了广泛的就业机会。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数据，2010年有1,189家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实现销售额和净收入分别达到3,040亿美元和390亿美元，雇佣人数约为154.1万。据中国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研究院统计，2010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共雇佣

184.2万人，缴纳税金149亿美元。尽管这些数据有出入，但从整体上看，美国在华投资企业为中国带来了数百亿美元的利润和每年将近200万工人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美国也从中美经贸关系中获益颇丰。据测算，2010年美国每向中国出口10亿美元货物和服务，能够创造8.66亿美元GDP附加值和6,300个就业岗位。2010年美国向中国共出口1,134亿美元，按此计算，共创造982亿美元附加值和71万个就业岗位。中国向美国出口物美价廉的商品，帮助美国压低了通货膨胀率。除了对美出口，美国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供应链终端，生产最终产品并分销世界。这提高了美国及其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力。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持续实现了大幅盈利。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量迅速增加。2000年到2011年间，美国向中国的出口额增长五倍以上。自2006年起，中国已经取代日本，位居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后，成为美国产品第三大进口国（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伙伴国的其余两位成员）。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是中国央行）目前持有1.2万亿美元美国国债，是全球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国。中国持续购买美国国债，有助于美国 and 全球压低利率水平，维持金融系统稳定。

因此，良好的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是双赢选择。

三、展望未来

未来前景

全球经济环境仍然不确定：美国经济复苏迟缓，欧元区似乎在从一场危机走向另一场危机。甚至连其他金砖四国经济体（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也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

中国已为其自身确立了2010至2020年期间实现人均GDP翻番和人均收入水平翻番的目标，届时将整体达到“小康”水平。由于其拥有经济基本

12 尽管中国早就颁布了各项法律，要求中国的工厂安装各种防污染设备，但某些工厂一直未曾启用防污染设备。最近，由于政府和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有所增强，国家进一步加强了使用这些设备的强制执行力度。

13 中国商务部的数字来自2011和2012年期间最终受益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变化量。否则，商务部2011年做出的直接估算是5.8亿美元。一家私营公司荣鼎集团已做出估算，2011年，中国对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达到46亿美元。

14 中国商务部的数字来自2011和2012年期间最终受益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变化量。否则，商务部2011年做出的直接估算是5.8亿美元。一家私营公司荣鼎集团已做出估算，2011年，中国对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达到46亿美元。

15 据国际货币基金（IMF）的数据，2011年美国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是578亿美元，而中国在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应存量为38亿美元。

的有利因素（即有形资本的快速增长及充足的富余劳动力），以及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丰富经验，中国应该能够实现其目标。这要求年均增长率达到7.5%。只要中国能够保持总需求的增长，这是能够实现的，而总需求的增长来源于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化以及个人及政府消费的增长^{16, 17}。个人消费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而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将是推动消费的主力军。据麦肯锡的预测，这一人数将从2012年的2.3亿人增至2022年的6.3亿人¹⁸。

然而，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中国仍将面临巨大挑战。从内部看，随着城市化加速和轻工业产品出口萎缩，能否实现和维持充分就业将继续考验中国政府。此外，中国为过去35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付出了代价，例如，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地区间和地区内）、基础教育和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基础设施不足、环境恶化现象严重（包括空气和水的质量问题）、工业和食品安全恶化，以及腐败现象泛滥。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强有力地解决。同时，中国还需要深化改革，并继续进一步扩大经济开放，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将以此作为首要工作来抓。

从外部看，除全球经济环境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之外，中国在东海和南海与其邻国之间一直存在领土争端问题。毫无疑问，中国和全球其他经济体需要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因此，对于各国政府而言，当务之急是要防止这些领土争端问题。相关国家应着眼未来，排除外部干扰和影响，相信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解决好有争议的问题，集中精力实现共同繁荣。美国和中国在维护该地区和平和繁荣方面都肩负着重要使命，

但最关键的是依靠这个地区的人民形成共识，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过去三年半的时间里，美国经济复苏缓慢，但出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迹象。总体上看，美国经济表现比几乎所有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好很多。此外，美国仍然具备非常充足的经济生产能力，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科技创新的主要来源地，例如谷歌、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脸谱（Facebook）和推特（Twitter）都是美国的发明。而美国页岩油气丰富储量的发现以及水力压裂技术的成熟使得美国更容易获得廉价能源，从而使其产业更具有潜在竞争性，尤其是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的情况下，保证了其能源安全。预计未来十年美国很可能会成为世界能源净出口国，这将成为“游戏改变者”，因为美国贸易逆差将大大减少，而美国能源价格将保持较低水平，成为制造业复苏的基础。在这些有利因素的基础上，美国经济预计在未来十年将以3%的年均速度增长¹⁹。

同时，降低持续的高失业率是美国的首要问题。美国还需要将整体周期性预算赤字降低到可控水平，建造和重建基础设施。美国应继续在教育和科技方面加大投入，以保持美国在创新方面的领先优势。在国际上，美国应该在保持全球和平稳定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从长期看，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领先优势在于，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能够吸引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赴美生活和工作。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学，在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这是未来几十年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比较优势。

图表8和图表9列出了未来十年美国和中国GDP水平和实际增长率的预测。到2022年，预计美国仍将是全球最大经济体。按2012年价格计算，美国GDP将达到21.1万亿美元，相比之下，中

16 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234美元（2012年价格）。十年之后的2020年这个数字将变为10,468美元（2012年价格）。这意味着人均GDP实际增速以及GDP增速每年将分别达到7.2%和7.7%。鉴于2011年和2012年的GDP实际增速分别为9.2%和7.8%，在今后十年的剩余时间内如果年均增速达到7.5%，将足以实现该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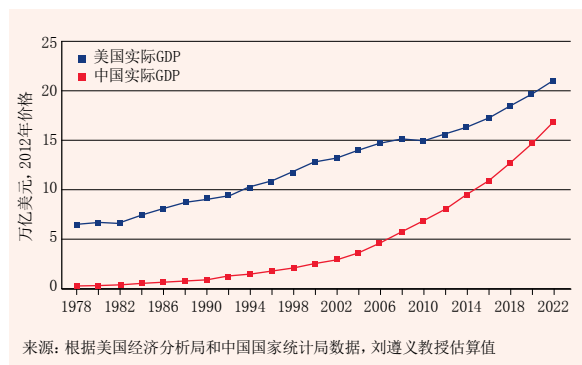
17 中国经济如今已不再像过去一样受到供给的限制，而是受到需求的制约。几乎主要的制造业部门都面临产能过剩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核心通胀率，也就是去除农产品和能源价格后的通胀率一直保持较低水平。

18 见第二部分第四篇分报告。

19 1983年至2007年这段时间被称做“大缓和时期”。美国的GDP1983年为7.07万亿美元，2007年为15.24万亿美元，根据2012年的价格，实际年均增速为3.25%。但是一些美国的经济学家认为将该增速作为一个长期的平均增速过于乐观，因为美国人口的不断变化和劳动力增长减缓，特别是当前经济复苏步伐异常缓慢，都会造成负面影响。

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十年：迈向更深层次的互惠合作

图表8：1978—2022年中美两国实际GDP的实际和预测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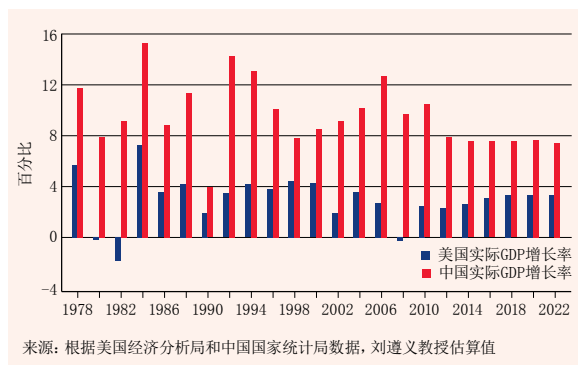


国虽然经济增速更高，但届时只有17万亿美元。美国实际人均GDP预计将达到62,600美元，而中国只有12,000美元，仍然比中国高出5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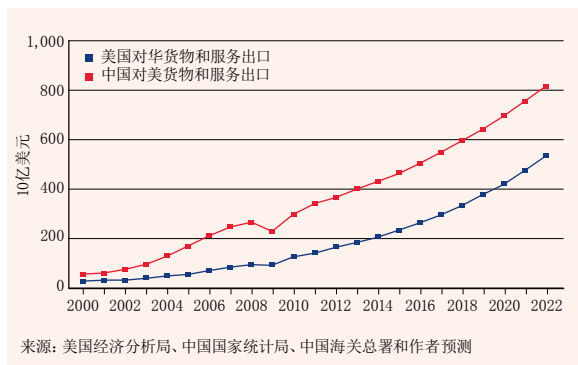
到2022年，中美两国很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还将成为全球最大进口国，美国对华出口预计将超过5,300亿美元，是目前规模的3倍以上²⁰。中国将取代加拿大和墨西哥，成为美国商品最大的进口国。美国每向中国出口10亿美元，将为美国带来8.66亿美元的GDP并每年创造6,300个就业岗位，按此计算，到2022年，美国对华出口预计产生价值为4,600亿美元的GDP以及超过334万个工作岗位，比2010年新增263万。考虑到中国对高技术产品和能源的旺盛需求，如果美国放宽高技术产品和石油天然气对华出口限制，美国对华出口额可能会更高。

到2022年，预计中国对美出口将达到8,050亿美元。据测算，中国每向美国出口10亿美元的商品或服务，将产生附加值5.98亿美元，并每年增加12,700个工作岗位，因此，2022年，预计中国对美出口将为中国带来4,800亿美元的GDP和1,022万人就业²¹。这些数据都非常瞩目。中国对美商品和服务的年贸易顺差有可能仍高达2,750亿美元（

图表9：1978—2022年中美两国实际GDP的实际和预测增长率



图表10：2000—2022年中美双边货物和服务出口的实际和预测值



见图表10)，但其占GDP的比例只有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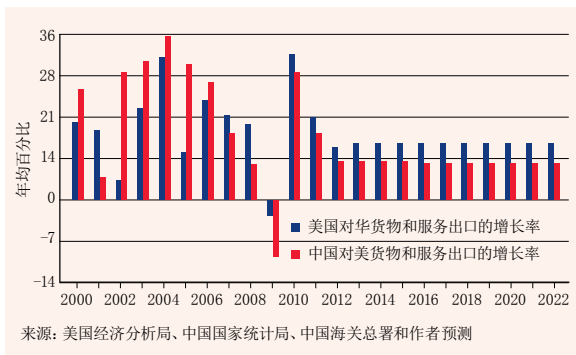
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也蕴藏了巨大机遇。目前，中国服务业产值占本国经济的比重不足45%，而美国则占到了80%²²。美国服务业成熟，具竞争力，服务水平高。中国服务业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美国服务业在中国市场前景广阔。2000—2010年十年间，尽管很少被关注，但美国服务业对华出口增长了五倍，其中包括法律、咨询、金融、会计等服务。这个趋势很可能将继续下去。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更多好莱坞电影在中国上映，NBA在中国受众极广，迪斯尼将在上海开设主题公园。这些只是个别例子，美国服务业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

20 5,300亿美元是2022年美国对华商品与服务出口量的四个估算值的平均值，这些估算值分别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Gary Hufbauer 博士和中美交流基金会的研究团队给出。见附件表1。

21 如果中国出口产品附加值上升，可能给中国带来更多GDP，但同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下降也可能降低就业率。

22 服务业包括政府服务。

图表11: 2000–2022年中美双边出口的实际和预测增长率



但是,这种贸易增长和给两国带来净收益的潜力并非唾手可得。双边或多边的紧张局势,或货币争端,以及宏观经济问题都可能使事态的发展背离我们的意愿。如果这些情景真的发生,中美两国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

中国自1978年成功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人民创造了大量财富。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分享到经济繁荣所带来的成果。同时,政府开始建设社会保障体系。中产阶层开始形成规模。其结果是,家庭消费开始增加,从最初的购买电视、家具和其他家居用品,到购买房屋、汽车、电脑、移动电话等。此外,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居民开始享受美食、娱乐活动和国内外旅行。大量留学生赴海外追求更好的教育。在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的拉动下,中国国内的实际零售额增速在过去十年达到了年均13.8%,或者说,比中国实际GDP增速快大约50%。但是,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不管是与历史的横向比较还是与历史的纵向比较,目前消费占中国GDP的比重很低。

预计未来十年中国中产阶层规模还将大幅增长,中国中产阶层需求快速增加,不仅为中国,也为美国乃至世界提供经济增长动力。这种需求不仅来自于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还来自于中国消费占GDP比重从很低的水平不断上升。

差异性和互补性

尽管从GDP和对外贸易总量来看,中美两国均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但两国间还是有很大不同。美国在技术方面是全球最发达国家,而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人均GDP高出中国8倍。两国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但是,正是由于存在巨大的差异,中美两国经济具有互补性。差异越大,两国比较优势重合的部分越少,经济交流合作实现的收益也越大。例如,具有相似自然资源禀赋的两个经济体,如果也具有相似的低工资率和高资本成本,则不会从彼此之间的贸易或投资中获得很多收益,因为他们产生的成本结构很可能是基本相同的²³。

从基本生产要素——有形(实物)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的可利用情况看,中美两国情况差别明显。美国有形资本(建筑物和设备)存量的绝对值几乎超过中国三分之一(2012年美国为23万亿美元,中国为18万亿美元),折合成劳动力人均值后,是中国的6.2倍²⁴。简单来讲,就是每个美国工人可以使用的建筑物和设备数量比中国工人高出6倍,这也是美国工人比中国工人生产率更高的原因之一。

从劳动力情况看,中国仍然拥有富余劳动力,2012年,其工龄人口几乎是美国的5倍。中美两国工资差异体现了中国的富余劳动力(以及劳动力中蕴含的人力资本的质量)。美国联邦政府法定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7.25美元,而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各省不同,北京的最低工资标准最高,为每小时2.43美元,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加权平均值仅为1.85美元。这表明尽管中国近些年非技术类初级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但仍然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

²³ 然而,如果他们专门从事不同的利基市场,即,如果他们有可能在随时创建的不同产业内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则发达经济体仍有可能从彼此之间的交易中获益。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2008)。

²⁴ 见第二部分第十一篇分报告。这些数据会随汇率变化而变化,但从整体上看,美国在有形资本劳动比上远超中国是不争的事实。

图表12: 2010-2012年中美生产要素比例比较

	中国			美国		
	2010	2011	2012	2010	2011	2012
工龄人口人均有形资本 (千美元, 2011年价格)	14.27	16.09	18.02	113.41	112.32	111.43
工龄人口人均耕地面积 (公顷)	0.12	0.12	0.12	0.79	0.78	0.78
工龄人口人均研发资本 (美元, 2005年价格)	382	449		15,731	16,058	
每一千工龄人口年均授予美国专利	0.003	0.003	0.004	0.522	0.523	0.580

来源: 中国人口普查数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中国统计局、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世界发展指数

从土地情况看,美国拥有1.63亿公顷可耕种土地,而中国只有1.22亿公顷。美国可耕种土地面积超过中国三分之一,但人口不到中国四分之一²⁵,因此人均可耕种土地面积比中国高出6倍。此外,美国农业具有很高的生产率。

从人力资本情况看,2012年美国高等教育总入学率为95%,而中国只有27%²⁶。相似地,美国工作适龄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接近40%,而中国只有不到10%。从研发资本情况看,2012年美国资本存量超出中国的10倍。同年美国授予本国公民专利数量为121,247个,而授予中国公民专利数量仅为3,786个²⁷。

图表12列出了美国与中国生产要素比例的比较情况,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美国在人均有形资本、人均耕地和人均研发资本方面都一直而且将继续领先于中国。这意味着美国在有形资本密集型产业、土地密集型产业(例如农业)、人力和研发资本密集型产业(例如高科技产业)领域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而中国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

虽然通过合理投资,有形资本、人力资本和研发资本会逐渐积累,但这需要经历较长时间。2012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占其GDP比重刚达到1.97%,而美国这个比重在过去几十年间达到2.5%到3%。因此,美国在无形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

很可能会持续至少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美国将继续为世界主要创新源头。同时,中美之间在有形资本劳动比方面也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同样需要花费时间追赶。而且,耕地面积也很难增加,所以相比中国,美国在土地密集型经济活动中将一直具有比较优势。

互补性的另一方面体现在两国储蓄率的巨大差异。美国总储蓄率大约为12%(扣除折旧后的私人储蓄率为8%,由于大量政府借款,国家净储蓄率略呈负数),而中国储蓄率则接近50%。中国储蓄和投资都过多,而美国储蓄太少。如果中国国内储蓄超过投资,那么中国将对全球产生外贸顺差,这种局面对于中国既不可持续,也不理想。如果中国将所有储蓄都形成投资,将不会产生贸易盈余,但将很可能导致过度投资,从而造成产能过剩和资本回报率下降。为了降低国内储蓄率,中国应着力提高国内个人消费。尽管中国正在努力,但将个人储蓄率降至30%左右的合理水平,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目前来看,国内需求的增加不能仅仅依靠国内个人消费,还应该通过加大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公共或政府消费、提供清洁空气和水等公共产品,以及扩大国内投资来实现。

共同的利益和责任

除了经济互补性,一些共同利益也为中美两国经济合作提供了机遇。例如,中国“十二五”(2011-2015年)规划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由出口

25 2012年美国和中国的人口分别为3.1亿人和13.39亿人。
26 入学率包括所有中学后教育,例如大学专科和职业技术学院。
27 第二部分第12篇分报告。

驱动转变为内需驱动，由资源投入型经济转变为创新型经济，从而实现国际贸易平衡。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将扩大国内总需求，包括投资和消费。此外，中国还将促进进口。这与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将在2014年实现美国出口翻一番的目标一致，中美两国可以通过合作推动美国对华出口，使之成为两国致力合作的途径之一。

为增加国内个人消费，中国需要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并提供可信的社会安全网。为了鼓励中国的创新，中国必须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力度。这不仅仅迫于美国及其它国家的压力，从自身利益而言也应如此。中国发明家与国外发明家一样，都应受到知识产权保护。

两国的共同经济利益，还包括降低全球经济系统失灵所带来的下行风险。尽管这种情况一般不可能发生，但如果真的发生，要限制其损害，这同样需要两国共同合作。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很快达成协议，分别在各自国家采取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

另一个共同的经济利益是维持国内完全就业。过去几十年间，全球出现了就业岗位由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稳步转移的趋势，近些年，这种趋势伴随全球化和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而有所加速。这是美国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始面临的挑战，也是中国这十年即将面临的挑战，因为与其他新兴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从更长期来看，也存在技术影响。计算机网络代替了普通白领的工作，且自动化和机器人也开始取代制造业领域的工作。就业增长主要体现在高技能专业领域，而低技能领域工作持续流失。目前尚没有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良好而快捷的办法。教育、培训和再培训将会有所帮助。同时还需要增加不可转移的就业岗位的数量，例如旅游服务业的岗位。通过进一步加深合作，两国可能会发现为双方带来工作岗位的领域和方式。例如扩大服务业可以为中国创造数百万工作机会。美国公司在服务业方面具有丰富经

验，在发展其自身服务业的同时，还可以帮助中国发展服务业，美国也可以进入中国不断增长的服务业市场并从中获利。

最后，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有责任共同引领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例如，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他们拥有共同的能源安全目标，同时还是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因而应该在降低气候变化风险和确保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共同承担责任。因此，两国应在提高能效、再生能源、核能、清洁煤及页岩气和页岩油技术方面进行大胆合作。另一个全球公共产品是由贸易、投资以及相关机构构成的多边贸易体系。再次强调，两国可以共同为全球经济增长持续增长提供所需要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四、迈向更深层次的合作

本报告第三节阐述了中美两国间未来的经济前景和巨大的经济互补性以及双方的共同利益。在这一节，我们将讨论两国应如何充分利用好这些机遇和互补性，在七大具有前景的领域，为两国的人民创造工作机会和经济繁荣。随后将针对两国政府、智库、企业界和其他社会各界提出开展合作的具体建议。

（一）货物与服务贸易

如本报告上一节所述，到2022年，中美两国将成为世界上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两个经济体如此不同，在两国之间签定自由贸易协定，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使两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目前能够完全发挥两国合作潜力的方法，就是两国在符合实际的情况下，尽快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但是，在付诸行动前，需要对中美自由贸易区进行认真的可行性、潜在利益和成本分析。

美国企业逐渐认识到，除了作为制造基地以外，对美国出口产品而言，中国市场蕴藏了巨大

潜力。过去十年间美国对华出口额增长了4倍多，然而，美国对华出口，尤其是美国中小企业对华出口的潜能尚未完全受到重视。鉴于中国物流及配送系统仍不完善，存在效率较低、独特性等问题，美国中小企业在进军中国市场的道路上遭遇了不少困难。

自几年前起，美国商务部和香港贸易发展局为帮助美国中小企业开发东亚的货物及服务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做出了一系列努力，颇具成效。这些机构每年在很多州进行走访交流，推动美国中小企业出口，中小企业对这些活动了解越多，他们对中国出口的可能性就越大。

另一种帮助美国中小企业向中国进口商销售货物和服务的可行方法，是每年在美国主要城市（如旧金山）举办出口贸易商品交易会。在促进美国出口方面，这类交易会可以发挥与中国过去每年为促进出口举办的广交会同样的作用。为确保交易会发挥其应有作用，美国出口企业和潜在出口企业、中方进口商及其他贸易和服务公司应积极参与，以尽快形成规模。它的优势在于，许多以往从未考虑出口的美国中小企业能以较低成本，不需出国就可以参加交易会。此外，还应鼓励美国中小企业参加在香港这类地方举办的贸易交易会，许多中国进口商和贸易公司都积极参加这些交易会。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省州级或城市级伙伴关系，也是帮助太平洋两岸中小企业建立联系的有效途径之一。中美两国进出口银行应加大对两国小企业出口的信贷支持。通过网上服务促进并加强双边贸易关系，还可以使两国中小企业提高销售的效率，降低成本。这应该是两国政府积极追求的目标。

（二）投资

鉴于中国国内消费和生产市场的持续快速增长预期，中国依然是美国直接投资的理想目的地。目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与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数量级相同，在中国政府的鼓励下，中国对美直

接投资将继续增长。中美两国需要进一步释放双边投资潜力，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和经济机遇。两国缔结双边投资协定将会提供巨大帮助。此外，中国政府可以考虑扩大《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鼓励”和“限制”目录，而美国政府可以考虑为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设立“安全港”目录，此举将极大推动中美双边投资流动。

此外，中国拥有庞大和日益增长的国内消费市场。那些早期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如通用汽车、福特、宝洁、沃尔玛、联邦快递、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等，均获得了巨额利益，赢得了可观的市场份额，而且在中国也已家喻户晓。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持续扩大，他们的在华利益将会进一步增加。美国的跨国公司在中国零售市场直接运营，可以满足中国中产阶级顾客的需求。

美国服务业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由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为内需（包括国内消费）拉动型经济，有望进一步扩大在中国服务业的规模。通过出口或直接投资的方式，美国在参与中国服务业发展过程中拥有巨大机遇。这一切已经发生：由美国公司开创的服务业连锁经营模式，已经轻而易举地植根中国。除此之外，许多中国本土的连锁店采用了这种进口模式，在各地不断涌现。大众娱乐等其他服务（NBA）也被引入中国。沃尔玛商场遍布各地。为了满足零售消费者需要，外国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全资子公司的形式进入中国服务业部分领域，实际上中国零售业已经非常开放。

在其他一些行业中，如银行业和保险业，中国出于宏观审慎和保护的原因，对开放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中国采取渐进的方式开放金融领域，以期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外国金融机构进入，也有助于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改革和自由化。根据现行规定，如果准许某家外国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商业银行全资子公司，那么以此类推，限制这家子公司在该

领域兼并、收购或持有其他金融机构不能超过20%的股份。中国的监管机构在该外国子公司总资产上设置限额，在其收购后设置适当的资本要求，这是合理的。可以考虑允许一些符合条件的外国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全资子公司，在该领域内无论是普通成长，还是兼并收购，那都已无关紧要了。

根据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估计，2012年美国家庭金融资产总额高达54.39万亿美元。然而，目前，对于美国个人投资者来说，中国间接投资机会非常有限。美国的个人投资者只有通过香港H股投资中国企业，或投资那些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交易所以及其他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他们还可以投资一些共同基金，这些基金往往由国外资产管理公司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名义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股票交易。但是，美国投资中国企业的个人投资者相对较少，所以，如果中国逐步取消资本管制，他们是否会冲击中国证券市场，目前尚不清楚。因此，在这一方面应审慎地进行，并且应在两国之间达成共识，协调防范风险的方法。

中国不少企业受到了美国市场欢迎，例如海尔和联想，它们均在美国投资设厂，生产家用电器和电脑。生产汽车配件和高端钢铁产品的企业也落户美国。事实上，日本为打开美国消费市场在美国投资建厂的做法很值得中国企业学习。美国能源、制造业和农业项目吸引了大量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房地产项目也引起了很多中国企业的兴趣。除此之外，基础设施投资也可能成为未来热点。所有这些经济活动都将为美国创造GDP和就业。

间接投资（也称“证券投资”）方面，由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央行）将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中国因此成为美国的主要间接投资国。中国拥有约1.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此外，中国还间接投资了约一万亿美元其他美元计价资产。随着国际社会逐渐接受人民币计价，以及

人民币在外贸结算中的广泛应用，中国央行将不需要持有如此巨额外汇储备。中国央行持有美国长期国债对美有利，但此刻这种做法可能会给中国央行带来资本风险，可能导致利率、通货膨胀以及汇率的变化。对美国财政部来说，一个可能的双赢策略是美国财政部出售给中国央行长期（例如30年）“通胀保值债券”（TIPS），或用其与中国央行目前持有的短期非通胀指数型国债进行互换。对于债券持有国来说，通胀保值债券不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抵御通货膨胀，还能降低利率和汇率方面的风险。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后，中国的私人投资者很可能成为美国股票市场、私募基金、对冲基金的重要投资者。目前，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约为9.5万亿美元。到2022年，中国实际人均GDP将翻一番，中国家庭财产将可能至少翻一番，达到19万亿美元。如果有机会，中国私人投资者将使投资更加多元化，加大投资外国金融资产。如果我们按照日本居民家庭3%的外国资产持有比例来计算，中国居民家庭对外间接投资将达到5,700亿美元，随着中国人均GDP和家庭财富的持续增长，预计每年中国私人对外间接投资将达到约285亿美元。美国需要大量新建或更新陈旧的基础设施，这将创造数百万就业岗位。中国投资者可以利用其储蓄盈余，以债券或股权方式，为其提供融资。这不仅对美国有利，对中国也有利，因为投资回报诱人。美国相关机构应该着手研究如何吸引中国投资者投资美国基础设施项目。

（三）农业合作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量持续增大。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意味着对肉类和家禽的需求也在显著增加，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将提高农产品需求，因为城市居民农产品消费量比农村居民高出50%。迄今，中国农业生产率的改善有助于满足人们对

更高质量食品的需求。但水资源及土地资源的缺乏，成为中国农业规模持续扩大的长期严重瓶颈。过度饲养家禽牲畜、大量使用农药、杀虫剂等产生的一系列环境卫生问题，也对人们的健康产生了长期危害。如何整合国内及全球资源和技术，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一项主要挑战。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农产品供应国，中国是美国农产品最大的销售市场，不仅是因为美国相对丰富的耕地面积和充沛的水资源，而且还由于美国农业的高效生产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而这一切都源于美国长期对农业研发的投资。在未来几年里，仅仅依靠提高国内供应，中国难以满足新增需求。然而，美国有能力扩大农业产量，以满足海外的新增需求，尤其是对谷物和肉类产品的需求。如果美国生产商能够确保中方具有可靠和长期稳定的需求，中国进口商能够确保美方产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那么美国出口中国的农产品数量将进一步增加。通过与中国的农业合作，美国充分利用剩余的土地资源，从而带动经济活动，创造新增的长期就业岗位。

目前，中国从世界各地进口猪肉、牛肉和鸡肉，但是从美国的进口却受到限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限制猪肉的进口是因为美国生产者用激素饲养猪，而这在中国和欧洲是禁止的。如果美国生产者承诺不再使用激素，如同对欧盟一样，中国市场就能够向美国开放猪肉进口。鉴于猪肉在中国饮食中的重要性，对猪肉潜在的需求是巨大的²⁸。第二，限制牛肉进口是因为疯牛病的风险。近年来，没有发现新的病例，已经扫清了 this 阻碍，但需要两国讨论并形成备忘录，一旦发现新的病例，应立即停止向中国出口。最后，从美国进口家禽屡次成为两国贸易纠纷的受害者，希望能够尽早解决这一争端。

因此，美国生产商有机会向中国提供猪肉、牛肉和鸡肉，另外还包括玉米和大豆，而在玉米和大豆的供应方面，美国一直是中国最大的供应国。在中国，转基因玉米和大豆被用作饲料。从长远来看，中国政府和食品业企业应该考虑直接从美国进口猪肉、牛肉和鸡肉，而不是进口饲料谷物。对中国来说，这可以节约稀缺的土地资源，提升猪肉、牛肉和鸡肉的质量，改善卫生条件，还有可能降低货运成本（饲料与肉的比例大约是8:1），以及为美国创造额外的经济活动和就业机会。

基于对中国粮食和食品安全的充分考虑，两国之间的农业合作潜力是巨大的，而且显然是双赢的。因此，中美两国应着力扩大这种合作。如果一切顺利，从现在起的未来十年，中美两国农产品的总贸易额将比现在翻一番。

在世界市场上，谷物和肉类的自由供应波动相对较小，一个促进美国增加对华农产品出口的有用方法是使用长期（例如20年）商品供应合同，买卖双方预先确定交易价格（例如在成本加利利润的基础上）。这种长期供应合约将会激励美国生产者投资于新的长期生产能力，与此同时，缓解中国进口商对商品供应不确定性的担忧。双方同意的定价机制也缓和了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美国生产者和中国进口商能够按照上述要求完成玉米、大豆等谷物产品的长期供应合同。肉类和家禽类也可以实行相似的长期供应合同。

然而，两国担心出于某种原因，其中一方政府可能会阻碍农产品从美国出口或者向中国进口。为了保护中国进口商及美国出口商的利益，确保这个长期合同的履行，合同可以规定，中国进口商将获得一个装有一年农产品供应量的仓库，以此作为供货担保。与此同时，如果供应确实被交付，中国进口商将一年购买农产品所需资金存入美国的第三方银行账户中，以此作为购买担保。在进出口双方事先协定下和政府支持下，

²⁸ 猪肉及其价格在中国的家庭消费和消费者价格指数中占据很大比例。中国的通货膨胀，很多时候是由于猪肉价格上涨而引起的。

这种担保安排足以防止双方不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因为，协议不论哪方违约，都会自动终止。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如果美国没有按照合同供货，那么拥有新产能的美国生产商将会面临无人购买的窘境。即便中国拒绝收货，中国进口商仍需付清货款。这样长期的供应合同能够免除中国对粮食安全方面的顾虑，建立真正的相互依存关系。

（四）旅游合作

正如本报告第二节“全球因素”中讨论的那样，在当今世界经济的环境下，任何一个可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的工作都会转移出去。然而，旅游业却并非如此。人们在住宿、食物、零售、交通、通讯，以及娱乐方面的需求能够刺激旅游业产生许多无法转移的低技能工作。比如，一个想去纽约旅游的人一定会亲自抵达纽约，在那里住宿、餐饮、购物，从而为当地服务业创造需求。

香港已经成为中国大陆游客的受益者。2003年，香港启动“港澳个人游”计划，旨在吸引内地游客赴港旅游，那时内地赴港过夜游客人数为850万²⁹。到2012年，这一数字增至3,490万，约占香港过夜游客总数的72%。大陆游客平均停留三晚，日均消费1,054美元。旅游业为香港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尽管香港的制造业和后台工作岗位基本上都转移到大陆或其他国家，但旅游业帮助拥有700万人口的香港的失业率降至3.2%。日本、欧洲、台湾经验也证明，大量富裕游客涌入将对当地经济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十年前，中国每年大概有1,660万出境游客（包括香港和澳门）。到2012年，这个数字增长到8,320万，到2022年，中国出境游客预计将达到1.827亿³⁰。美国吸引中国游客的原因很多：美

国是世界上最发达和技术领先的经济体，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和传奇的历史，是好莱坞、百老汇和迪斯尼的所在地，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还有美丽的自然风光。此外，中国游客对美国消费产品——从时装到电子产品的兴趣浓厚。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出境游将迅猛增长，这些游客将给当地带来强大的消费力量，从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2012年，约有150万中国游客赴美旅游。到2022年，这个数字很可能达到573万，占中国出境旅游总人数的3.1%。如果美国像对待日本韩国游客那样，同意给予中国免签证政策，那么预计到2022年，每年赴美旅游人数将大约在810万到1,070万之间。

据测算，中国赴美游客日均消费约750美元，假设平均停留14天，这意味着平均每个中国游客在美国的花销为9,000美元（没有计算抵达和离开当天）³¹。每100万中国游客赴美旅游，将在美国总共花费90亿美元，并创造35亿美元的附加值和61,352个就业岗位。到2022年，如果中国赴美旅游人数达到年均1,000万，那么预计将创造约350亿美元的GDP和61万个工作岗位。

如今，有13万名中国学生到美国求学。同样，也有3万名美国学子来到中国读书。两国已经承诺在接下来的五年当中，把美国来中国求学人数增至10万人。毫无疑问，交换留学生不仅是两国间建立友谊、增进理解的重要桥梁，还会为加快两国经济发展、促进就业作出重要和直接的贡献。赴美留学生（可把他们视为“长期游客”）也像游客一样，提高国内总需求。赴美的中国留学生每天花销较少，但每人每年总花销却很大，平均约为5万美元。假如每年有10万名中国留学生到美国深造，并且按照平均每人4年来算，那么这些学生一年的总支出则高达200亿美元。这能够另外创造78亿美元GDP和超过13.6万份固定工作

²⁹ 这个数字没有包括当天返回大陆的游客。

³⁰ 2011年3月，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一篇报告计算，2010-2020年间，预计中国游客出境旅游次数年增速为10%，2020年中国游客长途旅行次数将达到2,000万次。我们认为，考虑到日本、香港、台湾、韩国等地经验，10%的增速还是相对保守的。

³¹ 美国商务部测算，中国游客赴美人均消费7,100美元。

岗位。此外，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商业人士来往于两国之间，他们为GDP和就业带来的积极效果也十分显著。

2011年，美国赴华旅游游客约为212万，约为美国总出境旅客的3.6%。如果中国能够更好地宣传本国旅游资源，使游客更容易获得签证，美国赴华旅游游客数量将会增加。两国应共同致力于推动开展双边旅游。

两国之间的人员互访，不仅支撑了两国的经贸关系，也有助于两国人民增进互相理解和建立友谊，从而推动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两国经济关系越紧密，就有多人往来，两国之间的桥梁也会越牢固。

（五）科技合作

当今，不管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与中国比起来，美国的科技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对人力资本及研发多年来的投资。美国已经成为主要创新之源，比如iPhone和Facebook。美国在科技方面遥遥领先，远胜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所有国家。中美之间在科技领域无疑存在巨大差距，在短期内这一现象还将持续，接下来的十年也依然如此。

中国在不断加大对人力资本及研发的投资力度。同时，中国还在营造一种合作研究和创新的文化氛围。中国认识到科技对于其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1978年以来，在《中美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的推动下，中美两国在学术和研究领域的科技合作从未停止。合作领域包括：能源、环保、基础科学、交通、卫生、医药、核安全、民用核能技术、农业方面的研究等。知识产权保护是合作的主要障碍³²。在这方面，一个重要的步骤是两国政府建立平台，向中国人民宣传知识产权对未来发展的重要价值。不论是属于中国人或外国人

的知识产权，中国都必须进一步加强保护。实际上，中国需要从知识产权的消费者变成知识产权的生产者。

未来，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可以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和加强。一个值得两国政府认真考虑的合作内容是“载人航天项目”。毫无疑问，美国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也在该领域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我们相信载人航天项目可以给两国带来双赢。其他可行的合作项目包括基因组学，也就是通过应用遗传学疗法治疗目前的不治之症，以及通过传统中医治疗慢性病。

（六）能源合作与研究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国。两国共同生产世界上30%的能源，消耗世界上40%的能源。因此，能源安全是两国共有的目标。由于拥有丰富的页岩油和天然气以及水力压裂技术，美国有潜力成为最大的能源净出口国。这将使美国不再依赖局势动荡的中东地区供给石油。美国能源公司拥有领先的能源勘探和开采技术，可以和中国能源公司展开合作，以清洁有效的方式来开发页岩油和天然气，这将有益于两国经济³³。通过合作，美国可以帮助中国实现能源安全，摆脱对中东地区石油的依赖。这也可能使美国成为对华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

我们很高兴看到，2006年的战略经济对话使政府间能源领域的科技合作进一步扩大。从那时起，两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科技合作的重要性。为此，两国政府建立了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致力于合作开展清洁煤炭技术、电力汽车和节能建筑物等研究。两国的科学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广泛参与了这项合作，商界人士也应邀加入。

同时，两国政府鼓励企业界直接参与能源合作。如今，两国已经开展了大规模商业合作，涉

³² 见下文第5节的讨论。

³³ 根据2011年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IA）的预测，中国页岩气技术可采储量为1.3万亿立方英尺，超过美国50%。

及清洁煤、煤液化、智能电网、生物燃料、第三和第四代核能、高压输电、二氧化碳封存，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技术（煤制气）等。下面是两国成功实现科技合作的两个案例：

- 一、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美国西屋公司在中美两国合作建设了核电站，还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合作投标建设核电站。
- 二、中国神华集团和通用电气合作研究开发煤制气技术。
- 三、中国的新奥集团和美国的杜克能源公司合作开发清洁能源。

此外，两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两国人民非常关注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以及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能源方面的科技合作可以使能源使用更高效和更环保，也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通过携手合作，中美两国能够确保能源安全和能源价格合理，并降低气候变化风险。这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整个世界。

（七）加强可持续发展的合作

中美两国均已庄重承诺应对气候变化威胁，保护环境，帮助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两国都致力于减少排放。在私人部门的支持和参与下，两国政府已经启动在可再生能源、核能、清洁煤炭科技、电力汽车、二氧化碳封存，以及其它减少碳排放方面的合作研究。如果成功，这些研究将会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从而减缓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这应该成为两国优先考虑的问题。

五、向两国政府的建议

中美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和深入合作转化成经济机遇，需要两国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参与，特别是工商界的参与。但最重要的是，两国政府的领导作用将产生决定性影响。政府能够构建一

个公开、透明、公平和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吸引投资和贸易。因此，我们向两国政府提出八点建议。

- 一、借助两国政府机构的专家意见，两国智库就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和利益进行研究，并于一年内完成相关研究报告。如果取得积极的研究成果，则应发起两国相关谈判进程。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因此两国应带头重启多哈回合贸易谈判。
- 二、对建立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讨论已有不少时日。为了推动双边投资流动，我们催促两国政府尽快（最好在一年内）完成正在谈判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
- 三、两国政府需要鼓励更多企业在能源领域实现科技合作，例如可再生能源、页岩油气、二氧化碳捕捉、使用及隔离，以及电动汽车等。此外，由于以上合作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两国应在2013年12月的德班会议上达成共识，联合其他国家共同确保在2015年成功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关成果。
- 四、两国应该简化签证申请程序，并逐步将签证有效期延长至5年、10年，并最终实现免签。应该让两国人民感受到自己受到对方的欢迎。这些改变需要时间，但在两年内实现两国签证5年有效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开端。
- 五、在美国国务卿克里访华期间，两国同意在“战略与经济对话”层面建立一个讨论网络安全问题的特别小组。这个小组应致力于制定一个路线图，内容包括：第一，两国在网络安全领域如何加强合作和提高执行力；第二，两国如何合作制定一项针对网络空间的国际准则。这些任务迫在眉睫，我们建议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小组应该在18个月内完成此项谈判，并在此期间及时发布中期报告。
- 六、不管是出于全球还是国内利益考虑，中国都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保护法。事实上，由于激励创新、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需要，中国

自身也希望保护知识产权。为了达到此项目标，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我们对中国政府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国务院负责知识产权保护跨部门机构——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应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以确保顺利执行和制止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第二，中国应考虑建立一个全国性特别法庭处理知识产权纠纷，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中国知识产权纠纷问题的解决和处置；第三，我们发现，在近期“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推动下达成协议，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将在2013年底前全部使用正版软件。我们敦促所有国有企业和银行系统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此项工作。

七、放松高科技出口管制是中国的一贯主张。我们建议美国政府应加快处理该问题，并希望出现一个双赢结果。

八、美国部分针对中国企业贸易和投资的政府决策，包括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方案，建立在政治而不是政策考量之上。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运作应该更加透明，更容易被中方理解。我们建议美国政府发布更加清晰的投资审查流程。

在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下，中美经济互补性和深入交往的潜力将很大可能被释放出来。

六、结论

综上所述，中美经贸关系很明显可以，也应该达到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在未来十年，两个国家的坚定努力会给两国人民带来很多经济和就业机会。

奥巴马总统在2012年11月7日连任获胜后的演讲中说：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在他们成长的国家中，拥有最好的学校和教师，继续作为全球科技、发现 and 创新的领导者，拥有最好的工作岗位和全新的商业机遇。”

同样，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在2012年11月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说：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两国领导人的话表明，两国人民为自己和后代追求更好生活的目标是一致的，两国间更紧密的经贸合作将帮助两国人民实现他们的梦想。两国人民需要把握今天的机遇，开始为梦想的实现奠定基础。到2022年，正值尼克松总统访华50周年，我们希望通过更加深化经济合作实现共赢，推动中美关系在互信、互谅、和平的基础上持续发展。两国领导人开始了新一届任期。为了实现经济和两国人民就业的可持续增长，两国正在为经济发展确立一个新的方向。携起手来，两国一定能共创未来！时不我待，让我们抓住机遇！



执行委员会

共同召集人

冯国经

冯氏集团主席

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主席

中美交流基金会副主席

冯国经博士为冯氏集团主席，该集团是以香港为基地的跨国集团，核心业务包括贸易、物流、经销和零售，旗下利丰有限公司、利亚零售有限公司及利邦控股有限公司皆为香港联交所的上市公司。冯博士现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周大福珠宝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及土耳其 Koc Holding A.S. 的独立非执行董事，他亦是美国Prudential Financial, Inc 亚洲区咨询会的主席。

冯博士是国际商会荣誉主席，该商会总部设于法国巴黎。他亦为中美交流基金会副主席及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的「世界贸易未来」高级别咨商小组的成员。另冯博士透过经纶慈善基金有限公司创办了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该院是一所以香港为基地的独立非牟利智库。

冯博士在中国内地及香港担任多项社会公职，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和香港特区政府经济发展委员会成员等。

冯博士持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学学士及硕士、以及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曾任职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

刘遵义

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

斯坦福大学李国鼎经济发展荣休讲座教授

刘遵义教授一九六四年取得斯坦福大学物理学理学士学位(优异成绩)，并先后于一九六六年及一九六九年取得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经济学硕士与博士学位。他自一九六六年起任教于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一九七六年晋升为正教授，一九九二年出任该校首任李国鼎经济发展讲座教授，二零零六年自斯坦福大学退休并出任李国鼎经济发展荣休讲座教授。二零零四年至二零一零年间刘教授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二零一零年刘教授被委任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并兼任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



成员

迈克尔·博斯金 Michael J. BOSKIN

美国斯坦福大学Tully M. Friedman经济学讲座教授、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迈克尔·博斯金是斯坦福Tully M. Friedman经济学讲座教授，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同时还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他著有150多本著作和文章，涵盖国际经济发展、税收和预算理论和政策、储蓄和消费模式，以及变革的技术和人口统计学对资本、劳务及产品市场带来的影响。他在华尔街日报及其他重要报章常有署名专栏，包括一个通过报业联合组织在145个国家发行的全球经济双月专栏。

他在1989–1993年担任乔治布什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在此期间他推出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清洁空气法案引入SO_x排放交易概念，并就解决第三世界债务和储蓄贷款财务危机和对政府支出施加首要有效控制提供帮助。他曾担任消费者价格指数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1996年报告改变了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政府统计机构测量通货膨胀、生产率和实际GDP的方法。除了担任全球政府和企业顾问之外，博斯金博士还在不少企业和慈善机构担任董事。

博斯金博士于1967年以本科最高荣誉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作为杰出毕业生获校长荣誉奖，此后他于1968年在伯克利硕士毕业，1971年博士毕业，一直就学经济学。除了斯坦福和加州大学，他还曾在哈佛和耶鲁大学任教。在他众多的专业奖项和表彰中，博斯金博士最以斯坦福大学杰出教学奖为傲。

樊纲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北京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

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早年上山下乡，1982年由河北大学经济系（七七级）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主攻“西方经济学”专业，1985年至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至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94至1995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96年起创办国民经济研究所；2006年起兼任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2006–2010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委员。2004年被法国奥弗涅大学、2010年被加拿大皇家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2005、2008、2010年，樊纲连续三次被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与英《观点》杂志评选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2010年为“世界100位思想家”之一）。

执行委员会

成员

海闻

北京大学副校长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兼汇丰商学院院长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海闻，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1969年至1978年黑龙江虎林县红卫公社下乡。1978年至1982年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获学士学位。1991年6月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经济系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至1990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旧金山、圣克利门托）经济系讲师。1991年至1992年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系讲师。1992年至2002年美国福特路易斯学院商学院经济系助教授、副教授（终身职）。1995年回国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常务副主任。2005创办北京大学深圳商学院，任院长，2008年更名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社会兼职：中国经济学年会理事会理事长（2008-），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2000-），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1998-），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2011-）曾获中国国家教委、人事部“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等。

迈克尔·斯彭思 Michael SPENCE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坦福商学院Philip H. Knight管理学荣誉教授

200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迈克尔·斯彭思在2006-2010年期间担任发展中国家独立委员会主席。他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管理学荣誉教授以及前任院长（1990-1999）。他还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和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在2001年，斯彭思教授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曾著有《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一书，该书由Fe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于2011年5月出版。

斯彭思教授在Genpact和Mercadolibre以及一些私人机构担任董事会成员。他是斯坦福管理公司和国际商会研究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此外，他还担任Oak Hill投资管理公司和PIMCO公司的高级顾问。

